

朝鲜王朝时期《择里志》述略

——兼谈中国方志编纂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党 斌

提 要：李重焕《择里志》被誉为朝鲜王朝时期第一部人文地理学著作，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私人编著方志文献，对于朝鲜半岛方志具有重要意义。从《择里志》的体例和内容来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舆地纪胜》《舆地名胜志》等书编纂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方志文献编纂思想向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

关键词：李重焕 《择里志》 汉文方志 域外方志

古代朝鲜半岛在汉字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故今韩国、朝鲜均为汉文方志文献的集中存藏地。^①中国明清两代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受到中国方志编纂之风的影响，朝鲜王朝时期编纂了多部方志，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方志》《择里志》等最为著名。其中，李重焕所著《择里志》被誉为朝鲜王朝时期的第一部人文地理学著作，其在一定程度上受王象之《舆地纪胜》和曹学佺《舆地名胜志》的影响，是朝鲜王朝时期重要的方志文献之一，对其后朝鲜半岛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择里志》又名《八道志》《八道可居地》等，由朝鲜王朝著名地理学家李重焕于1751年完成。李重焕（1690—1756），朝鲜王朝京畿道骊州人，字辉祖，号青华山人。李重焕出身官宦世家，其曾祖李崇镇、祖父李泳、父亲李震休三人均曾在朝为官。李震休曾任江陵府使、安东府使和忠清道观察使等职。关于李重焕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文献均有少量记载。

朝鲜王朝肃宗十六年（1690），李重焕出生于骊州一个书香门第。幼年李重焕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家庭环境影响之下，勤奋研习各类典籍，以入仕做官为人生理想和目标。由于父亲李震休仕途中多次调任，幼年的李重焕曾跟随父亲多次迁居，辗转于朝鲜王朝境内的京畿道、忠清道、江原道、庆尚道等地。幼年的游历使李重焕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习俗，也为其编纂《择里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肃宗三十九年（1713），李重焕参加科举考试，并顺利步入仕途，任承文院正字（正七品）之职，时23岁。其后，他曾任金泉道察访（从六品）、典籍（正六品）等职，任职虽非高官，但仕途还算顺利。然而，在李重焕生活的时代，朝鲜王朝各官房、衙门和两班官僚肆意吞没公田，掠夺百姓土地，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进入18世纪，朝鲜王朝统治区域内先

^① 按，关于朝鲜半岛的汉文方志文献包括两类：一是通过不同途径流传至朝鲜半岛的明清及民国时期所修方志，二是朝鲜半岛诸政权编修的各类方志。此类汉文方志文献，今朝鲜方面存藏情况尚不明确，韩国方面存藏情况可参考党斌：《韩国现存中国地方志及其特征》，《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6期。

后爆发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如忠清南道天安、京畿道抱川、黄海道瑞兴、全罗道长兴、全罗道卢岭、平安道三登等农民起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持续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李重焕对于各地农民起义有着直观、深切的感触,也了解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这些经历或多或少地被反映在《择里志》之中。

18世纪前期同样是朝鲜王朝官员结党争权最为激烈的时期,李重焕更是党争的亲历者和朝鲜王朝景宗元年(1721)“辛壬士祸”的直接受害者。1721年,老论派和少论派关于立储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老论派提出立李礪为王储,少论派则坚决反对。大臣睦虎龙揭发老论派密谋废除景宗李昀篡位,使老论派的170余人被处死。此后,睦虎龙的“告密”被证实是诬告,少论派的金一镜和睦虎龙等人被诛杀。李重焕因曾借给睦虎龙马匹一事而受到牵连,被流放边地。虽然1727年李重焕曾被赦免,获得短暂自由,但之后又因党争受害,被再次发配偏远岛屿,过着居无定所、饱经风霜的日子。在亲身经历官场黑暗、党争士祸、多次流放之后,李重焕对于仕途失去了信心,决定辞去官职,转而游历山川、探访风俗、以文会友,并开始留意搜集和记录各类地理资料,为编纂《择里志》做准备。此后近20年间,李重焕几乎走遍了朝鲜王朝各地,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并最终于朝鲜英祖二十七年(1751)完成《择里志》一书。《择里志》虽自称记“士大夫可居之处”,但实际上则融入了李重焕一生的坎坷经历及其后半生广泛游历的所有内容,可以说是李重焕人生的另一种记录方式。在《择里志》编成后5年,即朝鲜英祖三十二年(1756),李重焕去世,享年66岁。

二

《择里志》是李重焕根据自身游历考察经历编成的私人著述,且由于李重焕的特殊仕宦经历,该书在成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均无法得到朝鲜王朝的官方认可。相较于朝鲜王朝政府官方编纂的各类方志文献,《择里志》体例不拘一格,内容更加丰富,且有大量亲身经历,因而更能迎合社会大众的喜好。因此,尽管有政府的严格限制,但《择里志》在士大夫及社会中下层人士中仍广泛流传。朝鲜王朝时期《择里志》流传的主要形式是抄本,而《择里志》仅仅凭借传抄的形式即成为朝鲜半岛尽人皆知的地理学著作,这更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价值所在。1921年,崔南善将《择里志》重新编校并刊印出版,即现在广泛流传的光文会本《择里志》。此后韩国明知大学也曾出版《择里志》。^①

崔南善(1890—1957)出生于汉城(今首尔)富裕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904年作为皇室特派留学生前往日本东京府立第一中学留学,1906年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地理历史科学习。他曾经以实地考察为主要方式,研究和编写了《枫岳游记》《寻春巡礼》《白头山觐参记》《金刚礼赞》《松漠燕云录》等地理游记。^②崔南善生平收藏了大量关于朝鲜时期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文献,总数达17万册。崔南善编校和出版的《择里志》在今朝鲜、韩国各类图书馆、档案馆中均有保存,也成为之后许多学者研究李重焕及其作品的重要

① 参见[朝鲜]李重焕著,[朝鲜]崔南善校:《择里志》,韩国明知大学出版社,1976年。按,目前韩国学界关于《择里志》的研究大多以崔南善整理的光文会本为基础资料,而韩国学者裴宇颂则认为崔南善整理本与《择里志》原本有着较大不同,参见[韩]裴宇颂:《〈择里志〉的历史重读:书面文本的比较》,《韩国文化》第33辑,韩国首尔大学韩国研究所,2004年。

② 关于崔南善生平经历和著述情况,参见崔一:《崔南善的满洲体验与〈千山游记〉》,《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曹中屏:《崔南善与其“不咸文化论”考》,《韩国学论文集》第2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

版本。此外,朝鲜、韩国许多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中还保存了18世纪以来的百余份《择里志》抄本。^①201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安大熙教授利用现存多种抄本重新整理,翻译出版了韩文版《择里志》。^②《择里志》正文部分包括“四民总论”“八道总论”“卜居总论”三部分。

“四民总论”篇幅最短,称:“古无士大夫,皆民也。民有四:士,贤而有德,国君仕之;不仕者,或为农、为工、为贾。昔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耕,农也;陶,工也;渔,商也。是以不仕于君,当归于农、工、贾之民。夫舜千古为民之法也,至治之极尔。”^③《择里志》的“四民”思想源自虞舜,体现了朝鲜王朝时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认同。李重焕在“四民总论”最后也说:“当一修士大夫之行,而此非礼不能礼,非富不立故。于是乎不得不立家置业,以四礼为抑,事俯育、持门户之计,是以作士大夫可居处。”^④这也正是李重焕编撰《择里志》的主要目的,即以亲身见闻阅历为世人选择适合定居生活之所提供指导,其书名亦取此意。

“八道总论”于开篇略述古朝鲜建置沿革云:“有八道:曰平安,临沈阳;曰咸镜,临女真;次则曰江原,承咸镜;曰黄海,承平安;曰京畿,在江原、黄海之南;京畿南则曰忠清及全罗;全罗之东即庆尚也。”^⑤此八道为朝鲜王朝时期建置,亦为今韩国主要行政区划之基础,朝鲜时期《东国舆地胜览》《大东方志》,清朝《大清一统志》《东藩纪要》等均有记载。^⑥在李重焕看来,朝鲜王朝士大夫多为高丽卿相之后裔,而诸道中,东南尚文学、多文士,西北尚武力、多武臣。这样的论断是李重焕据亲历见闻所作总结,亦可见朝鲜王朝时期南北之地域风俗特点和差别。八道总论之后,李重焕以由北而南的顺序依次记述八道山水名胜等自然地理信息,其间穿插记述前代掌故、文人诗词、民间传说等,篇幅亦由北而南,愈来愈详。上述八道之叙述虽然体例不尽相同,但兼收博采、内容丰富、描述细致,颇有文献价值。

“卜居总论”之下分为地理、生利、人心、山水4篇。地理篇中以阴阳数术之法谈论如何相地建宅立舍,包括水口、野势、山形、土色、水理、朝山6个方面。生利篇中记录诸道土壤肥沃程度之高下以及不同土壤所适合种植的作物品种,如镇安之烟草田、全州之姜田、临川之苎麻田等均有记载。此外还记录了当时各地因贸易而兴起的诸多规模不同的港口。人心篇开篇以简略语言叙述八道民风之大略,如“平安道人心醇厚”“咸镜道地接胡境,民皆劲悍”等,表面看来是对各地民风的叙述,实则以大量文字记录朝鲜王朝时期党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史实,涉及东人和西人、南人和北人、北人中之大北和小北、老论和少论等多个派别之间的争斗。这正是李重焕脱身宦海之后,对于自己亲历朋党之争的真实回忆和记录,颇具史料价值。山水篇在论述八道名

① 按,仅韩国各类机构收藏《择里志》抄本就多达80余种,但这些抄本或无书名和作者,或题写其他书名,应当与朝鲜王朝时期禁止李重焕《择里志》流传有关。据笔者所见资料来看,曾有学者提及台湾地区藏有李重焕《东国山水录》一书,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是《择里志》的一种版本,但未及目验,故仅存此一说。而中国大陆地区则暂未见到有《择里志》流传,故中国学界对于《择里志》的关注和了解则相对较少。

② 参见[朝鲜]李重焕著,[韩]安大熙译:《韩文全本择里志》,韩国人文出版社,2018年。

③ [朝鲜]李重焕著,崔南善校:《择里志》,光文会,1921年,第1页。

④ [朝鲜]李重焕著,崔南善校:《择里志》,第2页。

⑤ [朝鲜]李重焕著,崔南善校:《择里志》,第2页。

⑥ 参见魏嵩山:《朝鲜八道建置沿革考》,《韩国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山、名水的过程中,穿插叙述了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清两代的往来和交流,八道各地的民俗轶事和掌故传说与各地名胜古迹相关的文士诗赋等。

从《择里志》的体例、篇目和内容可以看出,它与《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大东方志》等朝鲜王朝时期方志文献有着明显的不同。事实上,《择里志》和《新增东国輿地胜览》等书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中国古代方志文献编纂思想在古代朝鲜半岛区域内的辐射和影响。

三

中国古代方志文献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方志文献,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者即涉及“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的历代文献资料,其渊源可上溯至《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等早期典籍;狭义者则是以疆域政区变化和古今地名演变为对象的沿革地理学文献,包括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以《大明一统志》为代表的一统志,唐宋以来的大量省志、县志等各级行政区划地方志。其中狭义方志文献的总体数量巨大,传播范围更是广及亚洲、欧洲、美洲等,是域外方志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资料。

伴随着汉字在古代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广泛使用,古代中国编纂方志文献的体例、方式等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均产生了广泛影响。《汉书·地理志》以现行行政区划作为编纂目次和体例方法,为此后中国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承袭,同时也对朝鲜半岛区域内的方志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半岛方志编纂大体分3个主要阶段。

一是王氏高丽。918年,王建结束了新罗后期三国争霸的局势,建立了统一的高丽王朝。高丽王朝与中国五代、宋、元、明等均有官方贡赐、民间贸易等往来和交流,历时475年(918—1392)。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方志编纂的定型、成熟、发展时期,先后编修了《元丰九域志》《輿地纪胜》《方輿胜览》《大元一统志》等书。由于高丽王朝高度重视汉文典籍,并大力倡导研习、翻印四部典籍,在此过程中中国方志亦传入高丽王朝,对其方志编纂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在高丽王朝时期金富轼所编《三国史记·地理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是高丽王朝的官修正史,也是朝鲜半岛现存年代最早的史书。《三国史记》设地理志4卷^①,在总述新罗、高句丽、百济建置沿革的基础上,对各县古今名称均有记载。《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内容和形式均显示其受到《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的影响。其内容记载较为简略,则与当时所存前代文献甚少有直接关系。

二是李氏朝鲜。1392年,李成桂废黜高丽王瑶建立了李氏朝鲜,其历国519年(1392—1910)。李氏朝鲜与中国明清两代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且不仅局限于官方贡赐和民间贸易,更发展为大量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而明、清两朝政府均高度重视方志的编纂,组织大量文人学者参与编纂方志文献,使方志编纂进入全盛时期。明清两代500余年编纂各类方志总数达7000余种,这些方志通过上述不同途径和形式陆续传入朝鲜半岛,推动了朝鲜半岛方志编纂的发展。李氏朝鲜前期最具代表性的志书是郑麟趾等编纂的《高丽史·地理志》。^②《高丽史·地理志》同样依《汉书·地理志》体例编写,全志共3卷,关于诸道府县建置沿革的记载则较《三国史记·地理志》更为详细。此外,李氏朝鲜时期亦形成了由地方编纂方志后

^① 参见[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34—37,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② 参见[朝鲜]郑麟趾等著,杨晓等点校:《高丽史》卷56—58,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

进呈中央的方志编纂方式,故方志数量明显增多,且类型也趋于丰富,除《高丽史·地理志》《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地理志》《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大东方志》外,还有大量道志、郡志、邑志、里志等。而上述志书大多为官方主持,由重要官员担任总裁官,组织网罗大量文人共同编纂,体例和内容侧重沿革地理的叙述,这些特点均与明、清方志编纂的情况基本相同。

三是日据时期。1905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乙巳条约》,1910年双方又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日本设立朝鲜总督府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直至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才结束。日本为了长期占领和统治管理朝鲜半岛,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朝鲜半岛各地的具体情况,编纂方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如《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一书,便收录日据朝鲜时期刊印的各类方志文献达380余种。^①这些方志虽然并非全部成书于日据时期,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据朝鲜时期方志编纂的情况。伴随着西学的传播,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方志编纂也受到西方地理学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即便当时西方地理学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但无论是方志编纂所据资料,还是各类方志的体例,仍然与同时期中国方志编纂的情况高度吻合,足见中国对朝鲜半岛方志编纂影响之深。

四

自王氏高丽至李氏朝鲜,再到日据朝鲜时期,朝鲜半岛方志编纂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虽然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但总体看来,中国方志编纂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这种影响在官方编纂的方志文献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朝鲜半岛各级方志文献基本依照行政区划命名,如《大东方志》《东国地理志》《全鲜志》等为全国总志;《松都志》《平壤小志》《平壤续志》为京畿国都之志;《咸镜南道志》《全罗南道志》为道志;《仁川府邑志》《长津府邑志》《济州邑志》《麻田郡邑志》《华洞志》等则为各级基层行政单位方志。这样的命名方式与中国古代方志的命名完全相同。

其次,朝鲜半岛方志文献中记载的大量地名均受到中国古代地名学的影响。除大量使用道、府、郡、县、州等各级政区通名外,还体现在以象形、谚传、史迹、人物、方位等作为地名渊源的解释,仿照中国避讳方式更改古代地名等方面。^②

再次,朝鲜半岛方志文献的编纂基本遵循中国古代方志编纂体例。如《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大东方志》等书的编排均是于首卷叙述都城建置沿革,再分别记载八道各府、郡、县的建置沿革。各卷之内的篇目则基本依照区域、形胜、风俗、山川、城郭、公廨、学校、桥梁、祠宇、陵寝、古迹、人物、艺文等逐一展开叙述。不同的方志,篇目顺序上虽然可能略有调整,或合并、或删增,但大体如此。这一点亦与中国古代方志体例基本相同。

相较而言,李重焕《择里志》与朝鲜王朝时期的其他方志文献有所不同。首先,《择里志》并非朝鲜王朝官方志书,而是李重焕的私人著述。官方编修志书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往往具有严格的要求,如规定必须详细记载建置沿革、疆域、城池、户数、土产、人物等内容,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而《择里志》并未受到此种官方修志范式体例的限制。其次,如前文所言,编纂

^① 参见傅德华:《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关于中国方志文献中地名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参见华林甫:《中国传统地名学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总第34期。

《择里志》的目的是为世人提供选择定居之所的建议和参考，其虽以行政区划的八道为纲，但在具体记述时更为灵活，在记录自然地理景观的同时，兼及人文地理内容，故而更容易为社会不同阶层接受和喜爱。再次，从《择里志》的文本内容来看，其记载并不局限于地理资料的记录，更广泛涉及历代传说、前朝掌故、当朝史实、文人诗作、名胜古迹、风土民情等方面，虽然略显繁杂，但使人读之如身临其境，更为生动。这样的记录方式与李重焕辞官之后多年的游历有着直接关系。

《择里志》的编纂思想和记录方式并非是李重焕首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輿地纪胜》《方輿胜览》《輿地名胜志》等为代表的另一种中国古代方志编修流派和思想的影响。南宋王象之编《輿地纪胜》的体例大体为先列郡、邑之因革，再记诸郡之风俗，其后则山川英华、人物奇杰、吏治循良、故老传说、方言异闻、诗章文翰无所不收。其编纂思想与前代沿革方志有着较大不同。^①王象之的这种编纂方式和指导思想在南宋祝穆《方輿胜览》、明代曹学佺《輿地名胜志》等书中均有体现。综观《择里志》全书，其篇目设计和内容编排方面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象之等人编纂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方志编纂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亦从侧面反映出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和交流状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 全

《西安馆藏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发行

2019年3月，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西安馆藏地方志联合目录》由陕西新华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馆藏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馆藏历代方志文献约3295种、74573卷、45753册，既有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各类印刷本，也有手稿本、传抄本，其中不乏历代著名志书和各种孤本、善本，具有较高的文化、史料及文物价值。全书按照古籍文献的学术要求规范，参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编纂体例，以西安地域各大图书馆和各有关单位编纂的馆藏古籍目录为基础性资料，并对市辖各县区图书馆、档案馆、地方志办等存藏情况做进一步的挖掘、搜集、著录。编纂依照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册数、藏书单位和备注等要素逐个著录，汇编成册，单行出版。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① 参见苏馥香：《〈輿地纪胜〉编纂特点探析》，《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苏晓光、尹薇：《王象之与宋代旅游地理名著〈輿地纪胜〉》，《兰台世界》2014年第18期。